

论 1957 年霹雳州华校学潮的斗争行动

黄慧菁、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

摘要

1957 年霹雳州学潮因反对殖民政府教育政策而爆发，涉及的华校数量为全马最高，动员超过三千名学生参与行动，对学校与当地华社均造成影响。然而，现有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槟城学潮，忽略霹雳州的规模与动员能力。本文运用塔罗有关社会运动的理论，并结合口述历史与文献资料，分析霹雳州华校学潮的斗争行动和机制。研究发现，学生采取多种抗争方式，涵盖常规型、破坏型及暴力型三类。常规型斗争包括集会、提呈议决案、喊口号和唱歌，因风险较低而最为普遍，容易动员学生参与；破坏型斗争如罢课和游行，旨在扰乱学校秩序并引发更大的社会关注；暴力冲突则多源于警方介入或局势失控。在组织结构方面，总务股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力，带领学生同时展开多种斗争策略，而动员能力较弱的学校则以和平、常规型斗争为主。整体而言，霹雳州学潮呈现从温和到激进的渐进式抗争策略，反映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的策略调整和应对方式。

关键词：学潮，霹雳州华校，社会运动，斗争策略

* 黄慧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何启才，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The Protests of The 1957 Perak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NG Wai Ching, HO Kee Chy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The 1957 Perak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erupted in opposition to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education policies. It involv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a and mobilised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exerting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schools and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However,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Penang student movement, overlooking the scale and mobilisation capacity in Perak. Drawing on Tarrow's theo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based on both oral histories and documentary sourc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test a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he Perak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adopted diverse forms of resistanc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conventional, disruption and violence. Conventional protests, including assemblies, resolutions, slogans, and singing, carried low risk, making them the most common and effective for mobilisation. Disruptive protests, such as boycotts and demonstrations, sought to disturb school operations and attract wider public attention. Violent clashes, in contrast, mostly arose from police intervention or situations beyond student control.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the General Affairs Unit demonstrated strong organisational capacity, enabling schools under its leadership to implement multiple strategies simultaneously, whereas schools with weaker mobilisation capacity relied mainly on peaceful, conventional protests. Overall, the Perak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revealed a gradual shift from moderate to radical strategies, reflecting students' tactical adjustments and responses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Keywords: student movement, Perak Chinese schools, social movement, protest strategies

一、前言

1950 年代，英殖民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实现马来亚民族团结。英政府于 1951 年推出《巴恩报告书》，提议废除各源流学校，以巫英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取代各族群方言学校，遭到华社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当局于同年推出的《方吴报告书》提倡母语教育，获得华社的广泛支持（郑良树，2001，页 86-149）。然而，英政府于 1952 年发布的《教育法令》和 1956 年的《拉萨报告》主张逐步推行单元流教育，严重限制了华校的自由运作。这一系列不利于华教发展的教育政策，导致各地华社民怨四起。

1955 年，由于日侵时代学校停办，导致超龄生过多，学校无法收容所有适龄儿童。为了统一儿童的学龄，英政府决定驱逐超龄生。霹雳州在 1957 年至 1960 年期间，共有 2,178 名中学超龄生（南洋商报，1957a），数量为全国最高，是超龄生被驱逐的重灾区。1957 年，英政府建议华校接受改制，作为申请政府津贴的条件。在政治环境和内部财政压力下，部分华校认为改制是维持运作的途径。当时槟城钟灵学校暗中申请政府津贴，曝光后引发全马抗议。11 月 14 日，钟灵学生展开学生运动，抗议钟灵接受改制，也抗议政府驱逐超龄生（乔阳，2010，页 35）。钟灵学运一路延烧，最终促成蔓延半岛各地的学潮，对槟城、吉隆坡、霹雳州、吉打、马六甲、柔佛等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霹雳州学潮涉及的华校数量为全马最高，共有 7 所中学参与这项抗议活动，分别是怡保霹雳女中、育才中学、培南中学、圣母玛利亚女中、华都牙也育群中学、金宝培元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这场学生运动，动员超过三千名学生参与罢课行动，对学校和当地华社均造成影响。然而，关于学潮的研究，几乎清一色只研究槟城，忽略了动员和规模同样浩大的霹雳州。事实上，霹雳州学潮沿袭于槟城和吉隆坡，霹雳州学生在学潮动员方面得到了槟城和吉隆坡学生的支持，实现了跨地区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联合行动。在霹雳州华校学潮中，不同学校的动员和斗争方式各异，导致抗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了最终的抗争结果。这些过程涉及许多社会运动的机制。本文将采用塔罗有关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 1957 年霹雳州华校学潮的斗争行动，以帮助理解影响这场学潮的关键因素。

二、霹雳州华校学潮的产生和发展

在追溯霹雳州学潮的起源时，不可不提及新加坡五一三学潮。这场发生于 1954 年的学潮被视为新加坡华校史上重要的学生运动之一，是一次动员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英校大学生以及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学生抗议活动。五一三学潮的初衷是新加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役法，但随着发展，它激发了新加坡社会对殖民政府

的反抗情绪,进一步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学生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但他们的抗议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殖民政府政策的关注和反思(谢炎辉,2014,页 53-56)。通过这场抗议活动,学生们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为马新后来的社会运动提供了范例和启示,激发了 1957 年马来亚华校学潮的兴起。

马来亚华校学潮虽然受到新加坡学潮的影响,延续了新加坡学潮的一些形式,但它的爆发主要源于华校中学生对教育政策的不满。1955 年,槟城钟灵中学改制事件震惊了华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尽管华教三机构派代表处理问题,但这一事件依然激发了学生对殖民政府和新政策的强烈不满(郑良树,2001,页 398-399)。钟灵中学的学生因此分别在 1955 年、1956 年和 1957 年发动了四次抗议活动¹1957 年 11 月,他们联合槟城其他三所中学——槟华女中、韩江中学和中华中学,举办了集会 and 大规模游行,四校学潮涉及超过两千名学生(南洋商报,1957b)。这次的抗议活动,推动了全国华校中学生和华社对于教育议题的关注和支持,直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华校学潮。学潮起源于槟城,然后迅速蔓延至其他地区,包括吉隆坡、霹雳、马六甲、吉打、柔佛和森美兰。学生们的诉求主要围绕抗议当局驱逐超龄生和改制华校的政策。

霹雳州学潮是槟城和吉隆坡学潮的延续,涉及 7 所华文中学。其中,怡保育才中学和霹雳女中的学潮由各校学生组成的总务股策划和带领(许元芳²,2008,页 277),培南中学的学生在中途加入,三校学潮动员了 3,000 名学生参与(星洲日报,1957a)。怡保学潮之后,抗议活动又蔓延到金宝、美罗和华都牙也,显示出霹雳州华校学生对教育政策的强烈不满与反对的决心。学生们通过议决案不仅抗议不公平的教育政策,还表达了对槟城和吉隆坡同学的支持。但其实反过来,槟城和吉隆坡的学生也同样支持着霹雳州的学生。霹雳州学潮爆发前,霹雳州学生曾向槟城和吉隆坡的学生寻求建议(许元芳,2008,页 279),共同的目标使得这些学生成为了盟友。槟城和吉隆坡先行爆发的学潮引起了政府当局和华社的关注,为霹雳州提供了示范性的抗议活动,进一步增强霹雳州学潮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霹雳州学潮的顺利爆发,离不开槟城、吉隆坡盟友的支持,以及当地华校中学生的广泛响应。

¹ 1955 年 8 月,钟灵学生集体呈交备忘录表示愿意多缴学费以减轻学校财政压力。然而,警方却以涉嫌参与“颠覆活动”的罪名逮捕了 7 名钟灵学生。35 个班级的约千名学生发起了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1956 年 11 月,学生举行集会,提出 10 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公布接受津贴的条件和经过;1957 年 4 月,约有百名钟灵学生在礼堂举办集会,学潮蔓延至韩江和中华中学;1957 年 11 月,钟灵、韩江、中华和槟华中学爆发学潮。

² 这篇收录于育才中学校刊的回忆录作者原为佚名。经向育才中学校友会确认,文章的作者为许元芳。当时由于担心文章公开后可能会给学校带来麻烦,作者选择匿名发表。现因作者已故,且经校友会同意,笔者方得以公开作者的真实姓名。

霹雳州学潮是以华社的诉求为基础发起的。在学潮发生之前，华社已经有了华教三机构代表与政府当局协调相关的问题，学潮的多项诉求中也包括了“支持华教三机构”的内容。参与学潮的学生明白，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改变现状，他们需要华社的全面支持和配合。通过学潮，一方面可以引发社会对华教议题的关注，借助媒体报道和公众的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集体行动能够展示华校学生的团结和力量，以此唤醒华社的共同意识，增强华社的凝聚力。通过引起华社的注意，能够唤起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总的来说，霹雳州学潮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学生们对教育政策的不满是推动学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槟城钟灵中学改制事件后，学生们开始发动抗议活动。其次，有影响力的盟友和学生的支持也为学潮的成功爆发提供了关键支持，这种团结和协作促使学生们更有信心表达自己的诉求。最后，学生们通过集体行动寻求华社的注意和支持，以形成更为强大的力量，向政府当局施压。综合这些因素，促成了霹雳州学潮的发生。

三、霹雳州华校学潮的斗争行动

根据塔罗的理论，公众斗争可分为暴力型斗争、常规型斗争、以及破坏型斗争。暴力型斗争是最容易发动的集体行动形式，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者召集大量追随者，只需要愤怒的人们采取暴力行动或发出暴力威胁。例如，用砖头、棍棒或铁链砸破窗户，或袭击受害者的头部；破坏型斗争则通过在公共场所进行集体性的挑衅行为，如集体坐下、站立或行进，来展示抗议者的团结，同时干扰对手、旁观者或当权者的日常生活，迫使他们关注抗议者的诉求。例如，游行示威或静坐示威；常规型斗争是最常见的集体行动形式，因为它所需的投入较少，风险也较低，因此能够吸引大量参与者，如罢工（Tarrow, 2011, pp. 102, 104–105, 112）。在霹雳州学潮中，由于学生和对手之间的斗争互动产生作用，导致学生们的战术出现新的斗争手法，也因此霹雳州学潮同时涉及了以上三种集体斗争方式。

为了顺利发动学潮，育才中学和霹雳女中的学生组织了“总务股”，以方便策划和指挥工作。在总务股的策划下，霹雳女中和育才中学的学生在校园内集体罢课、举行集会、请愿、通过议决案，之后育才中学的学生沿着路线游行至培南中学、圣母中学、三德中学和终点霹雳女中（许元芳，2008，页 277-278）。由于学生们的行动引来警方的镇压，因此他们的战术出现新的斗争手法，参与抗争的学生不得不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此外，霹雳州学潮也不只有总务股动员的学生参与。例如，怡保圣母女中、金宝培元中学、华都牙也育群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的学潮并不在总务股的规划之内，因此这些学校的动员、选择的斗争方式都有别于总务股所领导的行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非集体行动形式的斗争出现，例如个

别学生通过书面信件威胁当权者。这些不同形式的斗争手法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学潮的发展和影响力，使抗议者能够更有效地传达他们的诉求并对当局施压。

以下表格显示霹雳州各所华文中学发生学潮时，学生选择的集体斗争形式：

表一：霹雳州学潮各所中学学生选择的斗争形式

斗 争 形 式	涉及学潮的霹雳州华文中学						
	总务股领导						
	怡保 霹雳 女中	怡保 育才 中学	怡保 培南 中学	金宝 培元 中学	怡保 圣母 女中	华都 牙也 育群 中学	美罗 中华 中学
常规型斗争							
写标语	✓				✓	✓	
喊口号	✓	✓					
唱歌	✓	✓		✓	✓	✓	
派传单	✓	✓			✓		
集会	✓	✓			✓	✓	
请求举行集会				✓			
提交或 通过议决案	✓	✓		✓			✓
破坏型斗争							
骑脚车游行		✓	✓			✓	
罢课	✓	✓			✓	✓	
暴力型斗争							
暴力冲突	✓	✓	✓		✓		

资料来源：黄慧菁整理。

根据表一，除了怡保培南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之外，其他所有中学都举办了集会或向校长提出了举办集会的请求。美罗中华中学虽然没有举办集会，但各班代表一起向校长提出议决案（南洋商报，1957d），也是一种集体行动。举办集会和通过议决案成为学生们选择最多的斗争方式，这些集会伴随着写标语、喊口号和歌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行动。在集会上，学生们通过了几项反对驱逐超龄生、改制华校、考试以英文出题作答的教育政策的议决案。

这种形式符合塔罗定义的“常规型斗争”，因涉及风险较小而吸引大量的参与者。换句话说，霹雳州学潮能够动员大批学生参与其中，是因为集会是一种相当和平的抗议方式，在校内举办集会也降低了被警察镇压的风险，使得更多学生愿意加入这场斗争。事实上，在新加坡五一三学潮、槟城和吉隆坡学潮中，学生们

也选择了举办集会提出诉求。这也证明了集会的形式简单而有力，易于传播和复制，因而在多个学校迅速蔓延。这种集体行动模式使得学生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大规模的支持，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学生们的赞歌和口号内容也非常有煽动力，如霹雳女中的部分标语和口号“同学们站起来”、“谁阻止我们这正义的抗议就是我们的公敌，民族的罪人”、“团结就是力量”、“全体同学团结紧结成一条钢铁的心”、“同学们拿出力量，力量，力量！”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南洋商报，1957d）。这样的仪式化行动不仅能够激发参与者的热情，还能增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当几百位学生齐声高喊口号，校方也难以劝解他们解散。最后学生们在结束集会之前通过议决案，也强化了学生群体的集体意识和共同目标。

除了金宝培元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之外，其他每所中学的学生都进行了罢课，是另一种最多学生选择的抗争方式。根据塔罗的理论，他将工运的罢工归类为以破坏性的直接行动开始，最终被制度化的常规型斗争形式（Tarrow, 2011, p. 112）。在霹雳州学潮中，罢课没有被体制化，因此在本文被归类为“破坏型斗争”。

罢课之所以被归类在破坏型斗争，是因为学生们以反对教育政策为名，阻止学校日常上课、考试，并以此吸引更多支持者。罢课也经常与其他斗争形式结合在一起使用。例如，发生学潮的 4 所怡保中学和华都牙也育群中学的学生集体罢课，一起参与集会。这 5 所中学中，除了圣母女中之外，学生们在集会结束后还集体游行。这显示了在霹雳州学潮中，有些学校的学生同时进行了常规型斗争和破坏型斗争，也有的学校只进行了常规型斗争，这取决于学潮的动员能力。例如，怡保霹雳女中、育才中学和培南中学有总务股的指挥和带领，运动组织性和动员能力显然更强，因此实行了更多类型的斗争；金宝培元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是所有发生学潮的中学中，仅有的两所只进行常规型斗争的学校，参与学生较少，运动组织性和动员能力较弱。这是因为一些温和分子更倾向于避免罢课、游行、引来警方镇压带来的风险。他们倾向选择在不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向校方提出抗议，把更激进的行动留给那些更积极的人去执行。因此，这两所学校的学潮势头不及有总务股带领的学校。

破坏型斗争相对来说，有一种更间接的强制力。它是决心开展运动的具体表现（Tarrow, 2011, p. 104）。在怡保和华都牙也的华校学潮，学生们同时罢课并举行集会，通过在草场或篮球场集体挑衅地喊口号、开会、通过议决案，不管校方如何劝导都不愿解散，这是学生们建立以及向校方展示他们团结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他们向校方、当局发出挑战 and 寻求内部支持的方式。

通过罢课，示威的学生还有效地阻碍了校方、旁观者和其他没有参与学潮学生的日常活动。例如，在霹雳女中，三百多名学生举行集会，而没有参加的学生

则站在一旁观望 (Tarrow, 2011, p. 104)。在培南中学, 游行的育才学生影响了其他学生, 他们聚集在走廊观看并听育才学生喊口号 (胡禄焕, 2023)。同样, 圣母女中和华都牙也育群中学也出现了学生拒绝返回课室上课的情况。由于示威人数过多, 场面难以控制, 校方的劝阻无效, 最终这些学校被迫勒令放假, 学生们提前放学回家 (星洲日报, 1957b; 星洲日报, 1957c)。即使在没有发生学潮的三德中学, 学生们也因育才和培南罢课游行的影响而聚集观看, 没有上课 (胡禄焕, 2023)。这种通过罢课制造的“破坏”, 迫使校方关注抗议者的要求。学生们能够集中力量, 暂时增强他们的影响力, 从而更有效地向校方表达诉求和压力。

另一种涉及破坏型的斗争是游行。与罢课类似, 1957 年在马来亚, 游行示威并不是合法的行动, 也没有被体制化, 因此在本文中被归类为破坏型的斗争方式。游行是一种从罢课升级的斗争行动, 在霹雳州学潮中起到了双重作用。无论是罢课还是游行, 示威者的目标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群体的支持。罢课和游行这两种抗争方式相辅相成, 通过内部团结和外部扩展, 动员更多学生。罢课主要在校内进行, 通过凝聚更多的学生来与校方对抗, 建立内部团结, 以此向校方施加压力。游行则是在罢课之后的进一步行动, 旨在扩大影响力。学生从一所学校游行到另一所学校, 意在动员更多的学生参与, 以及吸引社会各界的注意。在游行过程中, 学生们无视交通规则, 阻碍交通, 聚集人群, 打乱日常社会秩序, 引起公众的不便和注意。这种行为直接向政府和教育当局传达了他们的抗议和不满, 迫使当局重视学生的诉求, 进行回应和妥协。

游行需要组织, 对动员能力的需求也更大, 因此参与游行的学校不多, 只有总务股带领的怡保学潮, 以及华都牙也育群中学的学潮策划了游行。在怡保学潮中, 总务股策划行程从育才中学出发, 经过培南中学、三德中学和圣母女中, 最终到达霹雳女中。学潮爆发当天, 育才中学宣布放假一天。当学生们在育才中学进行集会后, 总务股的负责人在讲台上宣布骑脚车在怡保市内游行, 并号召几所华文中学校联合支持罢课抗议行动。学生们响应号召, 解散后并没有立即回家, 而是集体骑脚车离开学校, 沿着江沙路 (Kuala Kangsar Road) 进入陶格拉斯路 (Douglas Road), 朝着培南中学的方向骑行 (许元芳, 2008, 页 277-278)。当育才学生抵达培南校园内的草场后, 他们高呼口号, 号召楼上的培南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动。培南的学生最初并未立即响应, 但在育才学生的持续呼喊和号召下, 最终有部分学生决定加入游行队伍 (胡禄焕, 2023)。

育才和培南的学生离开培南中学后, 继续向微露菲街 (Belfield Street) 前进, 随后转向波士打路 (Brewster Road), 再进入安达申路 (Anderson Road), 经过张伯伦路 (Chamberlain Road), 最终在金宝路霹雳女中新校舍 (Kampar Road) 集合 (南洋商报, 1957c)。当时的学生脚车队还经过了靠近波士打路的三德中学 (Church Street), 也试图号召三德中学的学生加入。然而, 尽管他们进入三德中学校园并进行呼喊, 但却没有三德的学生加入游行。随后, 他们从三德中学转向

圣母女中。根据胡禄焕的回忆，当他们游行至圣母女中时，圣母女中的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但依然没有学生加入游行。³他们继续前往霹雳女中。在整个游行过程中，学生脚车队不顾红绿灯信号，阻止其他车辆通行，保持队伍的持续前进。当时的人民进步党代表 Dr. Seenivasagam，坐在车里一直跟随在脚车队后面，见证了这场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胡禄焕，2023）。

然而，尽管警方镇压了游行至霹雳女中的各校学生，这些学生并未完全听从命令解散。相反，他们分成两队脚车队，在街上再次与警察发生冲突。学潮发生后的两天，依然有学生脚车队在街上游行。大约有三四百名骑脚车的学生，分成多个小队，穿梭在街头高声呼喊。每当他们遇到警察或镇压暴动队时，立即四散开来，消失在人群中，待镇暴队的车辆离去后，学生们又重新聚集。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无法有效地对这些学生采取行动，无法逮捕他们。

根据霹雳州档案局收藏的警局档案显示，学生们骑脚车游行的行为给警方带来相当大的麻烦。学校发生骚乱后，有数百名学生骑脚车穿行市区，完全扰乱了交通，并无视交通信号灯。然而，警方无法将这些学生视为未经许可的游行队伍来处理，因为学生们声称他们只是按照警方的指示回家。最终，警方以学生们可能引发治安问题为由，扣押了一些脚车。这立即引发了 Dr. Seenivasagam 的反应，他质问警方依据何法扣押脚车，并警告如果脚车受损将提起诉讼。警方随后告知，学生们可以随时前往警察局领取他们的脚车。由于学生骑脚车未触犯法令，致使当局怀疑参与学潮的学生曾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导致警方难以对付。警方更向记者表示，当局怀疑檳城的学生领袖曾在怡保学潮发生前一晚来临怡保与在地学生领袖会面。

此外，华都牙也育群中学的学生也参与了游行示威。两百多位学生在学校篮球场的集会结束后，带着写有“维护华文教育”标语的纸张走出校门，组成队伍在华都牙也街上游行了一圈。游行队伍中，部分学生骑着脚车，部分学生步行，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星洲日报，1957c）。

暴力型斗争在霹雳州学潮中并不是主要的斗争方式，但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发生了暴力事件。它是最容易发起的一种集体行动——孤立无知的愤怒的人们最容易采用的集体行动形式（Tarrow, 2011, p. 105）。暴力反映了一部分学生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可能采取的行为。发动学潮的学生，曾在学潮过程中以暴力行为对待记者

³ 1957 年 11 月 16 日，三所怡保华校爆发学潮。然而，当天的报章并未报道有学生脚车队游行至三德中学和圣母女中的情况。但育才中学学潮的参与者胡禄焕和周增禧在接受访问时，都提到当天脚车队曾游行到这两所学校，并且还能回忆起一些具体细节。相反，圣母女中学潮的经历者曾观佑则表示，圣母女中只在 11 月 19 日发生过一次学潮。报章关于圣母女中的报道也集中在 11 月 19 日的事件，完全没有提到 11 月 16 日发生过学潮。学潮已过去多年，受访者的记忆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本文采信报章的记录，更倾向于认为圣母女中仅在 11 月 19 日发生过学潮。

和警察。然而, 本文认为参与学潮的学生们本无意以暴力行动表达他们的诉求, 原因有二:

第一, 学潮的初衷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不满, 暴力是在校方和警方的干预下被迫采取的措施, 是学生们因为局势紧张和情绪激动而采取的极端行为。当学生们在校园内进行集会、罢课和游行时, 校方往往无法有效控制局面, 进而请求镇暴队和警察介入以维持秩序。然而, 这些执法力量的干预常常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升级, 迫使学生们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反击。例如, 圣母中学发生学潮时, 警方驱逐学生时使用了藤条, 学生使用木棍等工具反击时, 双方发生暴力冲突 (星洲日报, 1957b)。

另一个例子是育才和培南的学生组成的脚车队已经抵达霹雳女中, 这时一支持有枪械、催泪弹、木棍和藤鞭的镇暴队列队向学生方向前进 (许元芳, 2008, 页 278)。根据胡禄焕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回忆, 学生们与镇暴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警方施放催泪弹后, 学生们只能捂着口鼻, 试图躲避有毒气体。为了阻止镇暴队进入校园, 高年级的学生在霹雳女中校门处把脚车一辆一辆地叠起来, 形成一道临时的屏障; 低年级的学生则趁机从其他校门逃离, 避免被卷入冲突。整个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们和执法人员之间的对抗使得学潮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第二, 他们误以为记者是便衣警察, 想要在人群中搞破坏, 因此才会攻击记者。暴力行为是由于误判局势引起的, 这种误解导致了学生对记者的暴力行为, 但并非出于对媒体的敌意。例如, 育才中学的学生游行至培南中学时, 有几位报馆记者在场进行拍摄, 但被学生禁止。一名记者在拍摄时, 被学生们干涉, 并强行夺取底片。混乱中, 有人用石头丢向记者手中的摄影机, 但未击中。随后, 学生们声势汹汹地包围了那位摄影记者, 另一名记者试图进入人群中解围, 但未能成功。那位摄影记者向学生们解释自己是新闻记者, 是为了工作才来采访。学生们听后, 才平息了愤怒, 表示他们误以为记者是警方的便衣人员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并礼貌地向记者道歉。然而, 记者的摄像机在纷乱中掉在地上, 损坏得无法再使用 (南洋商报, 1957a)。

然而, 也有少数学生采取了主动攻击的行为, 他们采取暴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举例来说, 大约有 50 名学生组成的脚车队在波士打路上阻拦了一辆欧洲人的汽车, 并与该名欧洲人发生了冲突。当时一名警察和他的摄影师赶到并试图进行调解, 但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遭到一群学生的阻止, 他们上前用手拍打警车, 甚至向摄影师投掷石头, 导致摄影师的左手受伤 (南洋商报, 1957a)。在一些情况下, 学生可能感觉到和平抗议无法引起足够的关注或改变, 因此他们转而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来突出他们的诉求。然而, 这种暴力行为也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除了少数主动发起攻击的学生外，暴力型斗争在霹雳州学潮中的出现并非学生的本意，而是在和平手段无效时被迫采取的。这表明，学生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促使了抗议策略的自动调整。学生和警方作为抗议中的主要参与者，彼此的行为和反应直接影响了整个抗议的发展。学生最初采用的是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但当当局强硬介入时，局势失控，学生们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捍卫他们的诉求。这不是他们的首选，而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除了集体行动之外，霹雳州学潮的斗争还包括一些行动者选择单独进行的活动。其中，匿名信是常见的个人抗议手段之一。匿名信的作者往往因为对现状感到失望和无助，认为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因此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情绪和诉求。由于作者身份不明，匿名信的形式使得写信者能够在表达意见的同时，避免直接面临惩罚或报复。例如，霹雳州档案局收藏的马来亚联邦警察霹雳州特别分队记录显示，教育部部长佐哈里在学潮发生后收到一封来自霹雳州仁丹的匿名信。信中以中文写道：“这不是恫吓。若你不将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作废，我等必干掉你。你忠实的一群。”档案记录显示，匿名信的作者身份不明（Federation of Malaya Police, 1957）。

此外，还有一些霹雳州特别分队与金马伦警察局的书信资料显示，金马伦冷力的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曾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夹有一张纸条和两张《南洋商报》的剪报。纸条上以中文书写“狗子！狗子！奴才！奴才！”，而在两张剪报上，作者也写了一些句子。第一张剪报的内容是关于檳城学潮中被拘留的学生出庭，有二百位学生聚集在法庭前聆听，并且有镇暴队在法庭前守候。作者在该剪报上写道：“一些狗子出卖华教”、“今天英勇华校学生保卫华教而流血斗争”。第二张剪报的内容是关于芙蓉振华中学接受改制后，可能将聘请混血儿温凯斯担任校长。作者在该剪报上写道：“民族罪人！出卖华教者有何得益？”。经过调查，霹雳州特别分队表示，他们坚信匿名信的作者是怡保育才中学的学生黄万锭。黄万锭来自金马伦冷力，育才中学被勒令关闭后，他回到了家乡。收信人收到信的前一天，黄万锭已经回到了家中。虽然警方没有直接证据将这些信件与黄万锭联系起来，但他们认为信封上的笔迹是黄万锭的，因为他们手头上有一个简短的笔迹样本。出于安全原因，笔迹样本不能在法庭上出示。这些信件因其威胁性内容被转交到怡保警局处理（Federation of Malaya Police, 1957）。

四、结语

霹雳州学潮展现了学生们在抗争过程中采取的多种策略，主要分为常规型斗争、破坏型斗争和暴力冲突三类。常规型斗争是学潮中最常见的抗议形式，几乎每所参与学校都通过集会表达不满。这种抗议形式简单、风险较低，能够吸引大

量学生参与, 并迅速在不同学校传播。然而, 尽管集会有效传达了学生的诉求, 却难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部分学校如育才中学和霹雳女中, 除了集会外, 还发动了罢课和骑脚车游行等破坏型斗争。罢课通过抵制教学直接反对学校政策, 骑脚车游行则通过影响交通, 引起社会和媒体的注意。破坏型斗争的目的是通过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 迫使校方和政府正视学生的诉求。相比常规型斗争, 破坏型斗争的影响更大, 但风险也更高。当和平抗议无法取得进展时, 部分学校的抗争升级为暴力冲突。通常, 暴力冲突是在校方与学生对话失败后, 当局派遣镇暴队镇压时发生的。尽管学生最初采取非暴力手段, 但在面对强力镇压时被迫进行反抗, 导致抗争演变为暴力冲突。

此外, 各校学潮采取的抗争策略也取决于其动员能力。例如, 怡保霹雳女中、育才中学和培南中学在总务股的领导下展现了较强的组织性, 能够同时发动常规型和破坏型斗争。而金宝培元中学和美罗中华中学的动员能力较弱, 仅进行常规型斗争。这是因为学生群体中的温和分子更倾向于选择不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非激进抗议方式, 通过集会或向校方表达意见, 而将罢课、游行等更激进的行动留给那些态度更积极的人去执行。

整体来看, 学生们的斗争策略表现出一种渐进型的形态, 从温和的抗议逐步升级为更激进和暴力的对抗。这种策略的调整反映了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应对方式, 取决于学潮的动员能力和局势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南洋商报 (1957a, 10 月 10 日)。马华中央工委会将讨论超龄生教总提三项补救法列举超龄生被令离校严重情形全马中学超龄生约一万人。NewspaperSG。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71010-1.2.29.11>
- 南洋商报 (1957b, 11 月 15 日)。檳四中学发生风波抗议限制超龄生问题千余名学生集中檳华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NewspaperSG。<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71115-1.2.33.1>
- 南洋商报 (1957c, 11 月 17 日)。抗议中学改制及不收荣超龄生 怡三家中学发生学潮。NewspaperSG。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71117-1.2.31.1>
- 南洋商报 (1957d, 11 月 23 日)。美罗中华中学学生表示拥护三大机构主张支持各地同学行动)。NewspaperSG。<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571123-1.2.38.8>
- 乔阳 (2010)。忘不了的日子——檳城“11.14”学潮纪实。载于郑文波等 (主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 1957 年 11.14 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页 35)。全马华文中学校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
- 谢炎辉 (2014)。“五一三”全星华文中学校学生运动纪实。载于陈慧娴 (主编), 《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 五一三事件 60 周年纪念》(页 53-56)。Function 8 Limited。
- 许元芳 (2008)。风云动荡的五十年代——记 1957 年育才学潮。载于麦翔 (主编), 《百年育才·卷二》(页 277-279)。育才独中董事部。
- 星洲日报 (1957a, 11 月 17 日)。反对中学改制学潮蔓延至怡保三千学生罢课集会。NewspaperSG。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1117-1.2.31.1>

- 星洲日报 (1957b, 11 月 20 日)。怡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学生罢课与警察冲突。NewspaperSG。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1120-1.2.28.2>
- 星洲日报 (1957c, 11 月 22 日)。霹雳华都牙也育群学校中学生环市游行。NewspaperSG。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571122-1.2.44.1>
- 胡禄焕 (2023)。访谈, 12 月 20 日。
- 郑良树 (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Federation of Malaya Police (1957). *Riot & civil disorders - Chinese Schools - Petitions, allegations, information, etc, 1957*.
- Tarrow S. G.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